

祭

83岁老兵 放飞风筝祭亡灵

一个“祭”字代表一万个魂灵,30个“祭”代表30万死难者同胞;每一个“祭”字旁飘扬的黑色小飘带,是同胞们的泪水……昨天上午,83岁老兵车阿坤在南京燕子矶江畔放飞一组由30个“祭”字串成的风筝,来悼念南京大屠杀期间的30万死难同胞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徐萌 胡玉梅



老兵车阿坤在燕子矶江边放飞“祭”字风筝 现代快报记者 徐洋 摄

30个“祭”字风筝连成一排,直上云霄

黑色的底,黄色大大的“祭”字,每个“祭”都有很多黑色的小飘带……昨天上午10点多,防空警报过后,车阿坤和老伴以及风筝艺术俱乐部的同伴们拿出“祭”字风筝。“一共有30个‘祭’字,一个‘祭’代表一万个魂灵,‘祭’字下面的飘带,是人们无尽的泪水。”车老向现代快报记者介绍说,这组风筝线长12.13米,象征着“12·13”。

江风吹来,车阿坤手里握着风筝线,看着它们缓缓往上飞,而车老的手也不停歇,逐步把擦在地上的剩余“祭”字一点点往天上放。几分钟后,30个“祭”组成的风筝,像一

条长龙,一直向天上飘去。

车老说,这一组风筝花费了他3个月时间。今年9月开始着手,公祭日前夕完工。“做起来不难,但设计方案一改再改,让风筝既有特殊意义,又能飞得起来,还挺难的。”

车老说,去年的国家公祭日,他和同伴们放飞的是一组象征和平、正义、光明的风筝。今年之所以选择在燕子矶江畔放飞风筝,是因为南京大屠杀,长江边死了很多人,江水都被染红了,“从1958年起,我定居南京,到现在已经有57年了,对南京有感情。所以,特意来这里悼念死难先辈。”

小时候流落上海,曾与日本学生斗风筝

1937年,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战火蔓延到大江南北,当时,车阿坤还只是一个5岁大的孩子。“我老家是广东的,抗日战争爆发后,我老家的房子被侵华日军炸了。为了生活,我和姐姐跟着父母一路逃难到上海。”

车阿坤回忆,南京沦陷期间,他们一家躲在上海的难民营里,那时候姐姐出麻疹发烧,得不到及时治疗,死在了难民营。

与风筝结缘也是从难民营开始的。车阿坤对现代快报记者说,难民营对面是一片空地,经常有日本老师带着学生在那里放风筝,“他们的风筝有飞机形、坦克形,我们是

穷孩子,只能捡报纸和竹子来做风筝,线不结实,经常被日本学生的风筝线割断。”当时,车阿坤和小伙伴暗下决心,一定要斗赢日本学生的风筝。

车阿坤没钱买风筝纸和风筝线,就在街头捡香烟头挣钱。“香烟头没有过滤嘴,我们把里面的烟丝抽出来,然后用烟丝换钱,买了牛皮纸做风筝纸,把碎玻璃弄碎,和松香一起熬制后把风筝线放进去,这样风筝线就变得结实而锋利。”在后来的比斗中,车阿坤的风筝先割断好几个日本孩子的风筝,当时觉得心里很解恨……

上世纪50年代,为志愿军改棉服

1944年,车阿坤跟随父母,从上海辗转来到苏北,投靠了新四军第二军分区抗日兵工厂,帮忙做手榴弹等军用物资。后来,又调到射阳的被服厂做通讯员,负责敲钟送信。

1950年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,车阿坤回到了上海,在上海军服厂工作。“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一开始穿的衣服都很单薄,完全抵御不了寒冷,当时,棉衣棉裤如果超过1斤重,棉花就会不均匀,有的地方厚、有的地方薄,我在工厂里,改变了缝制方法,对缝制衣服

的工具也进行了改造,生产出来的棉衣质量好了,生产效率也提高了……我们后方生产的军服,很快就被送到了前线。”

1953年,车阿坤被评选为上海市劳动模范,受到当时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接见,并领取了陈毅亲手颁发的奖章证书。

如今的车阿坤被誉为“风筝怪才”,制作过3000多只风筝;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,他还专门制作了奥运长串风筝。而对于自己的往事,很少提及,“都过去了。”

忆

九旬幸存者 悼同胞几度落泪

昨天上午10点,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北极阁丛葬地举行了庄严的悼念活动。人群之中,91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正禧老人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,这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“要活到日本道歉那一天”的瘦弱老人,听着台上孩子的发言,悲从中来,忍不住嘴唇颤抖,热泪盈眶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王颖菲



伍正禧老人 现代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儿时逮蚰蚰的北极阁,那年尸体成山

早上9点不到,年过九旬的南京老人伍正禧就在志愿者陪同下,来到了北极阁丛葬地。“我早上5点就起床了,忙忙弄弄都没吃早饭。”老人手微微发颤地打开自己随身带的布包,里面装着用保鲜袋包着的十几块饼干,旁边是随身携带的药。“我都准备好了,饿了就吃。”老人说。但是一直到悼念活动结束,老人再也没有打开布包,饼干一块也没吃。

来到北极阁,老人心中压抑。老人说,从小至今,他的家一直就在附近,北极阁是他儿时常来玩耍的地方。“我们会在这逮蚰蚰。”然而日军攻入南京城后,这片童年乐土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。“北极阁周围都是死尸,堆成山一样。”

伍正禧的家,在这场浩劫中支离破碎。那时为了逃难,他的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住进了难民营。没想到,1937年12月13日,3名日本兵来到了他们在难民营里的家,伍家有5口人被带走,至今不知道他们被埋葬到了哪里。当天,日军将包括伍正禧家店铺在内的整条街店铺全部烧毁。

本以为灾难已过,哪知道到了12月17

日,日本兵再次来到家中,向伍正禧的奶奶要“花姑娘”未果,直接将其打伤,之后对着躺在床上、双目失明的爷爷连捅三刀。至此日本兵仍不罢休,发现后伍正禧30岁的表嫂后,将她奸污。回忆过程中,老人几度哽咽,不能自已,“太惨,一说心里发酸,一发酸,就要流眼泪。”

全程半跪着献花,希望所有青年人“不忘却”

悼念仪式结束后,老人在志愿者搀扶下,将一朵白花摆放在了纪念碑前。因为身体距离摆花的台子较远,老人为了尽量把身体往前倾,献花全程都是半跪着的。

老人说,每年除了12月13日这天,平时没事时,他常常会自己坐上公交车,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死去的家人。除了“自己不忘”,他更希望“全中国所有青年人都不忘却历史,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”。

此外,老人最不能接受的,是多年来日本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这些年,他曾数次前往日本申诉,请求赔偿,日本政府始终没有给予有效答复。在公开场合,这位瘦弱的老人曾不止一次表示:“我要活着,要继续起诉,要活到日本道歉的那一天。”

监斩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军法官之子: 父亲收集大量证据 将谷寿夫送上断头台

昨天上午8点多,南京市民杜伟一身素服,前往南京民间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。他的父亲杜慕陵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,还曾参与日本的横滨审判、引渡谷寿夫。他说,在国家公祭日举行悼念仪式,向遇难同胞告慰的同时,也提醒后人不忘国耻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金凤

“父亲英语很好,学过国际法,是‘国防部军法处’的军法官。”杜伟说,1944年,杜慕陵被派往印度利多镇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,出任盟军驻印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的首席军法官。

1946年1月,盟军在横滨设立了审判乙级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,由盟军统帅部邀请有关国家派员参加。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决定,选派童维纲、张乃文、杜慕陵参与军事法庭工作。

1946年2月,杜慕陵与童维纲、张乃文一起赶赴日本横滨,检举指控在中国战区的日本乙、丙级战犯,杜慕陵任检察官。为了在国际法庭开庭的时候能够提供大量的证据,杜慕陵开始四处收集证据资料。

谷寿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。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

会决定把谷寿夫引渡到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理。

“1946年8月中旬,谷寿夫被押回中国。这一年年底,父亲又被调回南京,协助国防部军事法庭进行取证工作。”杜伟说,当时,父亲废寝忘食地工作,他和红十字会、律师公会、记者联谊会等单位一起,对南京大屠杀的经过进行调查取证,查获具有确实证据、足以提供法庭作证的案件达2784件。

1947年4月26日中午,谷寿夫被绑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,杜慕陵代表军事法庭向他宣读了执行死刑令。“正是父亲和其他法官、检察官参与的大量调查,最终将谷寿夫推上断头台。”昨天,在纪念馆观看国家公祭仪式后,杜伟说:“设立国家公祭日,举行悼念仪式,是提醒后人不忘国耻,永远记住这段历史。”